

《百万英镑》与东亚共同体*

——无人背书的巨额支票如何生效

冯维江**

摘 要

本文回顾了东亚共同体建设中面临的困难，结合“鸠山构想”的内容、背景，对其背后蕴含的合作路径进行了评价。借助《百万英镑》的启发，论述了克服东亚共同体建设困难的若干思路。

关键词：《百万英镑》 “鸠山构想” 东亚共同体

一 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进程及其所面临的困境

马克·吐温在《百万英镑》中讲述了穷小子亨利机缘巧合获得一张百万英镑的支票所引发的故事。显然，这不是一张“见票即付”的支票，它甚至还缺乏必要的合法背书。因此亨利无法将其兑现，也不能存入银行账户中支取。即便是直接用之购物，别人也没办法找零。看似身怀巨富，实则不名一文。亨利随后的命运会怎样？他会饿死还是生活得很好？这正是将百万英镑借给亨利的两位极具好奇心的富翁打赌的内容。

东亚共同体就像那张巨额支票，可期待的票面利益极其庞大，却因为无人背书而没法实现。持有这张支票的潜在成员国们面临的形势比亨利更加复杂，它们之间会为这张支票而推诿或争夺，外界打赌的“富翁们”也极有暗施手段好让自己成为赢家的嫌疑。正因为如此，这张早在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EAVG）提交的报告中就开出的支票^①，迄今并未兑换出令人满意的现实利益。按照展望小组的构想，在东盟十国加中日韩三国（也即“10+3”）的框架下，东亚共同体由三个部分构成：作为地区政治合作机制的峰会，作为市场一体化机制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作为地区货币金融合作机制的区域基金。然而，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并未完全像展望小组设想的那样展开。

“支票”不能完全兑现，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有的地区成员不愿意其他成员“背书”东亚共同体，以免丧失未来在东亚共同体中的话语权。例如，政治合作机制方面，原先的10+3框架本意是由对话机制向制度化程度更高的东亚峰会转变，但是，日本由于担心10+3框架会被中国主导而提出了新的主张，致使东亚峰会“舍质求量”，放弃或至少是弱化了制度化方向的努力，转而追求成员数量的扩张，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接受为东亚峰会的成员。2010年第五届东亚峰会更是决定从2011年起邀请美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与会，从而将峰会的范围扩大到18国。

市场一体化机制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2000年中国率先提议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从而带动了日本、韩国很快跟进，而东盟则顺势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以及欧盟谈判了一系列“东盟+1”（也即10+1）自贸区协定。统合东亚区域自贸区的努力从2004年就开始

* 感谢周方银副研究员对本文的审阅指正，当然文责自负。

** 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 See EAVG, “East Asian Vision Group Report 2001: Toward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October 2001,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report2001.pdf>>

了。根据“10+3”经济部长会议的指示，建立了东亚自贸区（EAFTA）可行性研究专家组。到2009年，该专家组完成了两期研究报告。两份报告的一个核心建议是，东亚自贸区以“10+3”为基础，通过整合3个已经建立的“10+1”自贸区（分别是东盟-中国FTA，东盟-日本FTA和东盟-韩国FTA）来完成。然而，这项努力也出现了分歧，日本仍不同意建立以“10+3”为基础的自贸区，而提议建立以“10+6”（东亚峰会）为基础的自贸区，并且也推动成立了可行性研究专家组，提出了研究报告。由于出现了分歧，迄今，东亚自贸区的建设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①

其次，东亚的单个成员没有能力为地区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反映的是东亚共同体这张“支票”的购买力。可靠的区域公共产品越多，“支票”所能兑现的购买力越大。东亚经济合作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既不像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采取由美国这样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大国主导的模式，也不像欧盟那样采取由域内大国法国和德国联合领导的模式。^②

区域内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中，日本因为上世纪90年代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后，大量公司倒闭、银行不良债权居高不下，经历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失去的十年”。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形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好转，当前其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接近200%。日本在为东亚共同体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上大为受限。此外，日本因为曾经侵略亚洲邻国，至今并未实现真正的和解。这种状况也限制了日本提供公共产品的有效性。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管近年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增长迅速，但市场结构、经济结构上的缺陷制约了其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③从外部条件看，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或领土争端的存在，一些国家对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意图存有疑虑，不愿甚至抵制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

实际上，东亚地区最大的公共产品提供者美国位于区域之外。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美国主导着东亚的经济与安全，为了维护其主导地位而在东亚建立起了轮轴—辐条体系，而联系轮轴和辐条关系的就是美国建立起来的各种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才是东亚地区的主导公共产品。”^④域外霸权为东亚共同体“背书”的意愿和稳定性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同样无法强化东亚共同体的变现能力。

第三，与穷途潦倒到试图捡儿童咬过后扔到下水道里的梨子充饥的亨利不同，东亚地区成员并未面临山穷水尽的外部压力，因此，尽管各成员积极释放有利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信号，但其真实偏好可能是隐藏的，^⑤起码未能从其实际行动中显示出来。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进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危机推动的间歇性发展过程”充分展示了地区成员内在意愿和外部压力的双重不足。以该项合作最重要的制度化成果《清迈协议》为例。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2000年10+3财长签署的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也即《清迈协议》）。但是，危机之后，合作的动力骤失，“《清迈协议》的规模、贷款条件等都受到批评，其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性受到质疑，甚至有的评论认为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清迈协议》是否需要多边化和机制化，以及如何实行多边化和机制化都尚未形成共识。”^⑥直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规模的国际金融危机殃及东亚，《清迈协议》的多边化才在压力之下取得重要进展。2010年3月24日《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正式生效，

^① 张蕴岭：《推动东亚经济合作需要新思路》，《新视野》，2010年第3期。

^② 贺平：《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评析——区域公共产品的视角》，《当代亚太》，2009年第5期。

^③ 张蕴岭：《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趋势》，《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

^④ 苑基荣：《东亚公共产品供应模式、问题与中国选择》，《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

^⑤ 周方银：《共同体与东亚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

^⑥ 何帆、张斌、张明：《对《清迈协议》的评估及改革建议》，《国际金融研究》，2005年第7期。

将东亚货币合作由“松散的双边援助体系”提升为“较为紧密的多边资金救助机制”。^①不过这样的进展对于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预期来说还远远不够,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工作亟待完成:第一是建立和完善资金的集中管理机制和机构。目前的“储备库”并非真实的“资金池”,而是成员国的出资承诺。资金的实际管理权限仍在成员国政府手中。因此,这项制度的“硬化”有待各国将协议的出资额至少相当部分兑现为现金缴款来集中管理。第二,建设独立于IMF等机制的储备库监管机构。然而,危机再度“中道崩殂”,只留下菲薄的“制度遗产”。

二 “鸠山构想”的内容、背景与评价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取代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组成新政府,其后鸠山由纪夫首相于9月21日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按照欧盟模式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之后又在联合国大会演说、就职演说以及其他场合多次论及东亚共同体。^②自鸠山由纪夫倡言东亚共同体以来,这个一度有些沉寂的概念焕发了新的力量。^③鸠山由纪夫所谈的东亚共同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政治上以欧洲为范本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鸠山多次强调欧盟形成对他的启示。“曾经经历过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都在相互仇恨的德法两国,今天已经建立起了煤炭和钢铁的共同管理等合作关系。并随着国民相互之间交往的加深,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远离战争的共同体。尽管德法两国的共同体模式也曾经历过无数次的艰难曲折,但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最终发展成了今天的欧盟(EU)。”^④正是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德之间的和解与合作,让他萌生了东亚共同体构想。

其次,经济上强调用东亚共同体来抑制美国主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鸠山为《纽约时报》论坛版撰写的“日本的新道路”一文认为“近期的经济危机应归咎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将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视为普世和理想的经济秩序,并且所有国家都应当按照美国式的全球化去改造其传统的管理经济的方法。……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我相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球经济已经破坏了传统的经济活动并且摧毁了当地的社区。”^⑤鸠山尤其重视区域货币一体化的作用,尽管他也指出“没有一种货币做好了取代美元成为全世界关键货币的准备”,但他还是强调,应当追求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目标,为此应不遗余力地建设永久性安全框架,作为货币一体化的必要基础。

第三,文化上强调用“友爱精神”来建构东亚共同体的内部关系和身份认同。鸠山将“友爱”视为抵消“自由”之内在危险的一种力量,认为它能够终结不受限制、不讲道德和节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给人们的财产和生活造成的损害。根据“友爱”原则,在与人类生活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如农业、环境和医疗),那些唯利是图、以人为工具而非目的的自由市场政策将被否决。在此,鸠山强调的是一种超越了“一切人与一切人公平竞争”的友爱关系,更多地照顾非经济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更多地考虑自然和环境,重建福利及医疗体系,提供更好的教育和抚育政策,并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强调,东亚共同体就能从价值层面与美国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区别开来,从而实现自身的身份认同。

第四,形式上坚持“开放性地区合作”的原则。鸠山谈到,他所“考虑的东亚共同体构

^① 从益姣:《亚洲货币合作的整合和发展——基于清迈系列协议的分析》,《金融纵横》,2010年第8期。

^② 刘昌黎:《“鸠山构想”与中日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

^③ 从中国期刊网收录的文章统计,2009年9月鸠山发表东亚共同体构想之后的一年中,以此为题的文章达到70篇,而此前一年和两年,分别仅有8篇和11篇。

^④ 鸠山由纪夫:“献给亚洲的新的承诺——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实现”,

<http://www.cn.emb-japan.go.jp/fpolicy/seisaku091124.htm>。

^⑤ Yukio Hatoyama. A New Path for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August 26, 2009.

想就是要在‘开放性地区合作’的原则之下，通过推进相关国家在各个领域中的合作，在本地区建立起多个功能性共同体网络。……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大力推进在贸易、投资、金融、教育等广泛领域中的具体合作。在合作过程中，需要各国一起商定合作规则，一起协同行动，一起贡献智慧，共同遵守这个规则。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不仅将获得现实利益，也期待能培育起相互信赖的感情”。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成员，鸠山的回答是“拥有着共同理想和目标的人们”，“在某些领域中具备合作意愿和能力的国家可以先行参加，随着合作成果的显现，逐渐扩大成员国范围，这种形式也可以纳入考虑范围之内”^①。

鸠山提出东亚共同体之后，虽然得到中国、韩国在内一些国家的响应而有进一步的阐述，但由于“鸠山构想”的具体和真实内涵并不清晰^②，鸠山内阁的短命又让这一概念的政策外延无法充分展开，加之其他国家的媒体在翻译时往往从自己关注的方向上截取、强化或引申“鸠山构想”的部分内容，从而造成了种种误解。尽管鸠山内阁已经解散，但从鸠山的个人经历、他对国内外形势之研判等背景入手来澄清这些误解，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日本部分政治力量对东亚共同体的看法，并从中获得一些建设性的启示。

首先，以欧洲为范本并不意味着要马上放弃“东盟模式”而践行“欧盟模式”。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功能性合作还是制度性合作；是“协商一致”原则还是“多数决定”原则；所达成的协议是否有约束力等。^③鸠山提出东亚共同体有其个人家族经历的影响。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郎曾经翻译过“欧盟之父”卡雷尔基的《自由与人生》，鸠山家族的“友爱”思想源于卡雷尔基在这本书中对“友爱革命”的表述。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直接渊源也是卡雷尔基的著作《泛欧论》中对“不战、和平和统一的欧洲共同体”的设想。卡雷尔基的欧共体路线图的第一阶段是“设立探讨欧洲各国在关税、裁军、货币等方面的共同利益的政府间组成的委员会”，这与鸠山由纪夫所说的“多个功能性共同体网络”相对应，其实质更近于现实的“东盟模式”的功能性合作而非“欧盟模式”的制度性合作。至于正式的关税同盟和通货同盟，在卡雷尔基设想中，已经是在缔结了相互安全保障条约之后的第三阶段的任务了。^④鸠山由纪夫强调亚洲区域货币应以地区永久性安全框架为基础，也源出于此。因此，“鸠山构想”首先谋求的是东亚各国继续深化和扩大功能性合作，并非马上更弦易张代之以“欧盟模式”的制度化合作。

其次，“鸠山构想”引起的对中日、日美关系的误读也需要澄清。例如一些中国媒体认为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意味着日本“脱美返亚”，这反映了一些人对民主党比自民党在外交关系上更加“亲华”的期待；而一些美国媒体则把关切点放在日本谋求与美国“对等关系”之上，于是质疑日本试图改变美日关系。实际上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既不意味着“脱美”，也不意味着“亲中”，而是希望在平衡中美关系过程中实现日本的利益。一方面，日本希望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来应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它又需要东亚经济一体化来制约美国式自由放任经济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其中既有借力中国增长助益其国内经济的成分，也有拉拢东盟国家限制中国经济活动的成分。^⑤

第三，还需要澄清的是对“鸠山构想”中“开放性地区合作”的含义可能存在的误解。通常对东亚“开放的地区主义”的理解是“主张在东亚共同体建构中，将主要利益相关方美

^① 鸠山由纪夫：“献给亚洲的新的承诺——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实现”，<http://www.cn.emb-japan.go.jp/fpolicy/seisaku091124.htm>

^② 笔者在今年9月份访问日本外务省时了解到日本官员也承认虽然鸠山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名目，但具体的含义并不清楚或确定。

^③ 宋均营：《鸠山“东亚共同体”构想评析》，《理论月刊》，2010年第6期。

^④ 鸠山家族对卡雷尔基思想的传承参见胡令远，艾菁：《鸠山由纪夫的“友爱”理念及其源流》，《日本学刊》，2009年第6期。

^⑤ Yang, L., and C. K. Lim. “Hatoyama's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9. www.eai.nus.edu.sg/BB487.pdf.

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关切方纳入进来”^①。然而，这样的主张容易引起争议。例如，有学者强调“区域合作总有个地理概念，在界定的地理范围内吸收成员是一条基本原则。北美是这样做的，欧洲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人说三道四。20世纪90年代，作为同族同祖、同文化共价值观的西欧盟国澳大利亚，想入伙欧盟未果。如果新加坡和日本申请加入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美欧必定板起脸孔说不……如果吸收美国，就应该叫美国东亚共同体；如果澳大利亚进来，就应该叫澳洲东亚共同体；如果印度也进来，就应该叫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东亚共同体”。^②

“鸠山构想”常常为人所诟病的地方是没有明确东亚共同体的具体范围，实际上鸠山强调的是共同体的内容而非其结构和框架。他认为早期不应强调成员，而应更多强调合作的内容或领域。共同体本身是具体的合作的结果，而非事先的合作方式或平台。^③因此，“鸠山构想”中地区合作的“开放性”，主要是合作领域或议题的开放性。也即认同东亚共同体目标的成员可以提出任何领域的议题，有合作意愿和能力的其他成员可以先行参与。在一个远景目标激励之下，所有人都可以是倡议者，开放的议题之间通过竞争来吸引资源，占优的成果可以引起更多进一步的投入，这些成果的累积最终应有利于和能够促成东亚共同体的实现。然而，关注的焦点一开始就集中到“鸠山构想”的共同体成员到底包括哪些以及是否排斥美国等问题之上，以日本的立场自然无法排斥美国的参与。如此一来，“鸠山构想”关于议题及合作领域开放性的侧重则被有意无意地弱化了。

时至今日，鸠山由纪夫本人成为日本首相宝座上匆匆过客中的一员，鸠山内阁也早已经解体，人们不能期待日本政府对一位“政治短命”的前首相的一项既缺乏严密之体系、也缺乏清晰之细节的联想投入更多的政治资源。然而，“鸠山构想”是否有价值（以及如果有的话，价值有多大）并不取决于它能否马上转变为日本的政策，而取决于它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对“无人背书的巨额支票”之利益实现有所助益。

总的来说，“鸠山构想”的解决方案是要为东亚共同体这张巨额“支票”寻找“合法背书人”。首先，它强调按照“友爱精神”，参照法德和解，实现日本与亚洲国家主要是中国的真正和解和共生，这是要从内部解决“背书”的意愿不足问题（也即“互拆墙脚”问题）。其次，它构造了对传统经济形态构成破坏性威胁的“不讲道德和节制的美国式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是要构建外部压力来解决“背书”的意愿不足问题（也即将经济危机的威胁制度化、长期化）。第三，“鸠山构想”提出从个别的具体领域入手，“有合作意愿和能力的成员先行”，这是想解决为东亚共同体“背书”的能力不足问题。因此，“鸠山构想”的基本想法是，在经济危机的外部制度性根源的压力之下，中日两国通过政治决断实现和解，共同倡导和推动提供两国有能力提供、并且目前尚未有人提供的各类地区公共产品，在此过程中不断增进地区成员间的“友爱”、认同和公共产品提供能力，争取在长期中用本地提供的区域公共产品替代外部提供的公共产品（例如集体安全替代外部保护伞）。这也是鸠山由纪夫首先要向胡锦涛而非别的国家元首倡议东亚共同体的原因所在。

“鸠山构想”尽管细节上不无启发，但整体上缺乏可行性。其一，抽象的“友爱精神”缺乏坚实的情感和利益基础，既不足以让度尽劫波的亚洲兄弟与右翼势力和思想至今未获彻底清算的原侵略者日本相逢一笑泯恩仇，也不足以让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迅速崛起带来的资源、能源、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现实压力视而不见。其二，经济周期的波动性让经济危机无法成为促成合作意愿的持续动力。法德和解的外部压力在于美苏争霸在国际关系上带来的持续稳定的挤压，而“鸠山构想”构造的美国式全球化压力对包括中日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影响却是好坏夹杂，令感受者喜忧参半，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也是间隔和断续的。第三，即便是

^① 刘贞晔：《“东亚共同体”不可能是“开放的地区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

^② 刘学成：《东亚共同体构想与美国的东亚战略》，《亚非纵横》，2009年第6期。

^③ Yang, L., and C. K Lim(2009).

中日联合倡导推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也无法包办东亚共同体的公共产品建设。更严重的是,一旦中日为东亚共同体联合“背书”的意向付诸行动,势必与当前的区域公共产品的最大提供方美国形成冲突,作为美国长期的军事盟友,日本显然缺乏立足亚洲直面美国的勇气。不过,“鸠山构想”中从具体领域入手、“有合作意愿和能力的成员先行”的建议,是富有洞见的想法。

三 《百万英镑》的启示

与《百万英镑》中的情节相似,为巨额支票寻找背书人的方案实施难度极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办法在背书人缺失的情况下实现支票的价值。由于数额太大而亨利的身份又不足以向强势的第三方银行表明其持有的合法性,直接兑换或转存亨利都将面临牢狱之灾。这就是富翁之一敢于打赌亨利将怀巨富之财而饿死的依据。

然而,情节的发展并未导向悲剧。当亨利去小吃店吃饭、去服装店购衣后,欲用百万英镑支票付账时,老板们自然无法找零,并且他们都选择了赊账的做法。这意味着,没有合法背书人的真实支票虽然无法兑现,但相关的利益却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并非无条件的。

首先,小吃店和服装店的老板不如银行强势,不会质疑真实支票来源的合法性。其次,在小吃店和服装店的结算是渐进、分散和小规模的,没有引起金融当局的注意和质疑。第三,支票利益的实现对相关各方都有好处,小吃店和服装店的老板做成了生意并且这种商业关系会在未来继续下去、商业价值会不断实现,而亨利则获得了供其生存下来的现实利益,从而有机会在未来获得更大的收益。乃至富翁都可能会最终发现,亨利是个不错的女婿。

《百万英镑》对我们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有哪些启示呢?

启示之一:将“剩余控制权”悬置而重视“合同收益权”。不要试图以单方或组建集团的方式去从形式上主导东亚共同体的“制度”,谋取着眼于未来收益的、整体的、框架性的控制,指望所有未定事宜都由“背书人”说了算。以区内国家目前的实力来看,无论是单个国家还是若干国家联合为整张支票背书都面临“合法性”遭到质疑或颠覆的风险。为此,正如“鸠山构想”所言,应当重视具体领域的合作,“勿以善小而不为”,抓住落实个别“合同”的具体收益。

启示之二:重视区域内中小国家的“主导权”。以往人们过于重视区域内大国或国家集团在合作中的作用,实际上小国的关切未必不能促成共同体的利益实现。强调大国的利益容易造成分歧,照顾小国的利益更容易达成合作。东盟各成员也都有各自的关切,“海上东盟”与“陆上东盟”的利益诉求就有显著的差异。由这些小国来倡导和主持特定领域的合作议题,其他国家根据自身利益的相关性来选择参与的形式和程度,能够有效减少区外干预的风险。

启示之三:不要将“鸡蛋”都放在东亚共同体这个“篮子”里。“百万英镑”实际上并非亨利的财产,他的财富来自借助“百万英镑”带来的其他投资机会。对于中国这样的具备世界影响的大国而言,区域合作终究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更重要的是,借助东亚共同体在内的区域合作方式,探索发展中大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为全世界削减贫困和实现永久和平作出中国风格的贡献。

The Million Pound Banknote and East Asian Community:
How to Make the Huge Unendorsed Check Official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ifficulties in building East Asian Community (EAC), discusses the content and background of Hatoyama Scheme for EAC, and evaluates the way to EAC. Inspired by Mark Twain's works, we explore the methods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above.

Keywords: *The Million Pound Banknote* Hatoyama Scheme East Asian Community